

如何呈現我的女性言說？

劉虹

各位老師好！由於時間所限，我從長篇演講稿《先成為人：我的女性寫作立場》後半部分縮寫成這篇發言，故難免在邏輯上、舉例上等方面都會有所疏漏，權作拋磚引玉吧。

先談寫作的大前提，這當然關涉寫作主體。作為女性作家詩人，我認為，在寫作中首先要淡化這個“女”字，淡化性別意識，讓自己努力接近成為一個具有現代文明素養的、豐富完整的“人”來進入寫作。簡言之：要先成為“人”，而不是“女”——這是我的女性寫作立場的前提（這當然同樣適用於男性作家）。

既然是作為人的寫作，那麼其一，寫出關懷人的作品，即具有厚重內容、思想超越的“人文關懷”；其二，寫出關注當下的作品，即具有社會緊迫問題意識的“現實關懷”。

我的女性寫作立場也許更多地表現為：主題是關乎人的；題材則側重於女性群體的生命體驗。

我的整體寫作、包括女性題材寫作，內驅力都來自自我對社會存在和個體及族群生命的痛切感！

並非說作家自己一定要經歷諸多苦難，但必須具備超乎常人的強大的“共情能力”，能對他人苦難設身處地、感同身受、將心比心。談到這一點，我特別要感謝與我亦師亦友的何與懷博士，以他著名評論家的敏感和深刻，居然在20多年前初見我、初讀我的作品時，就敏銳地洞悉到這一點，為我寫出了一萬餘字的長篇評論，標題就是《痛苦，是她詩歌的源泉》。的確，優秀的作品回答現實關切，必然體現出作家的心跳聲，以及他與大地同步的疼痛感，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：詩人是為世界喊疼的人；以此為基礎才有可能升華為博大的“悲憫情懷”——這，正是文學寫作應追求的至高境界。

再談如何呈現我的女性言說，我於新世紀出版的兩部詩集，都專門闢出一輯書寫女性題材，落腳點都是在呼籲女性的主體意識和精神的現代化。我的女性言說具體可概括為以下五點：

第一，對社會環境和傳統文化的誤導、婦女觀念的倒退不遺餘力地揭批。比如《特區的她們》等，描寫病態環境中部分女性人生觀的病態扭曲。

第二，對社會弱勢群體中的弱勢群體——城市打工妹悲慘處境感同身受的痛切關注和強烈呼籲。比如《深圳打工妹》組詩8首、《飄落的樹葉》等。

第三，正面書寫理想狀態的女性存在姿態，張揚獨立人格、自由精神，性靈綻放，全面發展。比如《有一種女人》《關於她們的十四行》《狼毒花》等。

第四，描寫這塊土地上男女兩性關係相處的真相，指陳其違逆現代文明主流的荒謬之處，用了帶有冷幽默語調的自嘲口吻。比如《螺帽與螺釘》《男人女人》等。其中的代表作是《沙發》，以人格化的物借喻扭曲的女性生存姿態，被唐曉渡等評論家讚為：對女性生存真相悲劇性的深刻揭示，具有“命名的能力”。

第五，努力拓展對女性話題的思考深度：既揭示當下生存境況，更把書寫的筆尖犀利地楔入民族歷史文化的深處，找出社會悲劇的真正根源。其代表作是我寫於2003年“疑似乳腺癌”動手術前夜的《致乳房》。此詩超越一己之悲，沉痛而又深刻揭示了女性境遇的歷史悲劇性，痛陳傳統文化的荼毒乃至屠戮，發出關愛女性命運、以及困厄中的女性自尊自強寧折不彎的強烈呼聲。

這首詩曾被評論家稱為“詩壇經典之作”，殊不知當時極度痛苦中的我是當作絕筆寫的。它曾被海內外媒體廣泛轉載，被國家級的《中華文學選刊》轉發在扉頁。著名評論家張清華曾感歎：“我為她的《致乳房》感到震驚！這是一首寫給女

性的歷史、也是寫給個人命運的詩篇，它所包含的悲劇的文化與生命體驗，比過去我所讀到的所有‘女性主義’的作品都要濃厚強烈得多。我從劉虹的大量詩歌中讀到了強烈的人格力量。”

而最令我難以忘懷的是，此詩最早、最隆重的反響正是在悉尼。這又要感謝何與懷博士——記得當時我把初稿電郵給了關注我手術結果的何博士，作為此詩的第一讀者和第一評者，他在不久後的長篇評論中如此寫到：“《致乳房》發在2003年《澳洲新報·澳華新文苑》第58期上。我加了這樣一個‘編者按’：三月八日，劉虹於懷疑乳腺癌的手術前夜，寫下《致乳房》這首詩。多麼凄美、蕩氣迴腸的詩句！多麼深刻、真誠而又獨特的感覺！面對人生難關，她竟然能夠寫出這樣一首詩！也許正是處在嚴峻的生命體驗下，在惶恐中，又在極度的虔誠執著中，才能寫出這樣具有思想深度、又閃爍文彩的詩章。在眾多關於女人乳房的詩中，《致乳房》無疑是上乘的一首。”旋即他又安排了在2003年端午詩人節上，悉尼華語電臺幾名播音員聯合朗誦了此詩。這一切讓我感念至今！

記得15年前我獲得第三屆中國女性文學獎時，記者訪問我寫作中的“女性視角”。我回答說：無論“女性視角”還是“男性視角”，都必須首先具備一雙人的眼睛。在寫作中，這樣的“眼睛”也可稱作“雙性視角”，它應該是超越性別的。而這樣的“眼睛”所構成的現代關係，應該是平等的“對視”，既不是舊時代女人的“仰視”，也不是激進的女權主義的“俯視”；同時尤須警惕：中國女性普遍不自覺地、甚至主動地甘為“被視”——即傳統文化灌輸的、幾近刻入基因的“被看意識”。孰料五四新文化運動百年之後，卻還有那麼多的女人、包括一些女寫手把自己當作男人眼中的獵物、尤物和寵物，主動迎合男性目光包括價值尺度，自甘於“被觀賞”的位置，成為男性目光的消費物件，且充滿了交易盤算。我在1987年出席詩刊社第七屆青春詩會時創作的愛情詩《向大海》，就特別強調了男女兩性的平等“對視”，“我，作為一個女人和你對視”，這一句是反復迴旋於這首詩的基本詠歎。

記者還問到性別導致了怎樣的寫作差異。我認為在詩寫中，性別的差異，永遠不會大於個性的差異。女作家首先要把自己當作具體性的存在，要努力成為具備現代人格、內在豐富、精神獨立的個人；其次，在表達上忠實於自身的生命體驗，從而發掘出個體言說的獨特性。那麼，其性別意識的豐盈飽滿自在其中；所謂“女性視角”、“女性意識”的表達，也是水到渠成的；“寫作差異”也將不求自來——不是追求與“男人”的，而是與“別人”的不同。寫作中，還應盡量從性別意識上升為“人”的意識：力求以豐富飽滿的“個性”獨秀文苑，而不是以刻意營造的“女性”引誘被看。

綜上所述，我的女性言說似可通俗地概括為：寫作時少想著自己是女人。除了要最大限度地綻放自己獨特的生命體驗，更重要的是，應以一種超性別視角，把對女性個體生命的關注上升為對整個人類關注，追求普遍人性的健康與和諧發展；以期建立起兩性相生、良性互動的現代人文景觀；並以此拓展女性寫作的廣度和深度。

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西蒙·波伏娃正是從女性成長的主體性和現代性的角度，在其名著《第二性》中道出了這句至理名言：“她們決定，在做一個賢妻良母之前，先要做一個完整的人。”

——與此同理：要做好一個女作家，更應先追求成為“完整的人”。

謝謝大家！

澳華新文苑

第1208期 (B)

痛苦是她詩歌的源泉：解讀劉虹

何與懷

（接上期）這首詩可以看作是一個理想主義者的絕筆。它差不多是被當作遺囑寫的。所以，劉虹回憶說，當時的心情凜冽、決絕而又澎湃，基本是一氣呵成。又恰逢婦女節，全世界關注女性的時刻，但“這個女人的夜晚，我送行女人的美麗”，她卻只能淒涼地泣血而歌，自有一種諷刺的意味，充滿了生命的悖論！

《致乳房》全詩共五章，每章十一行，形式上比較整齊。以劉虹當時的心境和緊迫的時間，她根本來不及考慮詩歌形式的問題，可以說是自然流淌。現在人們都一致指出，這首詩的形式是其主旨的非常恰當、完美的載體。劉虹謙虛地說這屬於“歪打正著”，當然不是這麼簡單。

三

許多論者都贊同，《致乳房》可以視作深度詩寫的成功範本（對比之下，當代中國詩壇泛濫一時的下半身詩歌作者應當羞愧得無地自容——只是這些詩人毫無羞愧之心），體現了劉虹堅定的理想主義詩寫立場，她要傳達出：在這塊土地上，一個心地高潔、精神豐富、有靈魂操守的女性，在深刻的自我認定之上對痛苦宿命的擔當。當然，以劉虹的人生觀和精神疆域，她不可能局限於一己的命運悲哀，自然流淌出的是高標於世俗之上的一個大寫的人，對生命和世界的審視與浩歌。

再以《打工的名字》為例。這是劉虹另一首重要的作品，動筆於2003年元月，3月修改定稿。一年之後，劉虹告訴我，此詩近期引起了文壇的關注，幾家報刊發表和轉載，包括《中國雜文選刊》，但她並不以為然——文學媒體也是跟風，跟黨中央“關注農民工弱勢群體”文件精神之風。而這首詩遠遠早於此風之前寫成，早先投稿卻無人搭理。一家國家級大刊物在投稿8個月後、“風”盛之時，才又翻出來，說詩好，要發，責怪劉虹已轉投邊塞小刊《綠風》發出了（！）。

《打工的名字》A章整個是“名稱”的排列：

本名 民工
小名 打工仔/妹
學名 進城務工者
別名 三無人員
曾用名 盲流

尊稱 城市建設者
呢稱 農民兄弟
俗稱 鄉巴佬
綽號 遊民

翁名 無產階級同盟軍
父名 人民民主專政基石之一
臨時戶口名 社會不穩定因素
永久憲法名 公民
家族封號 主人
時髦稱呼 弱勢群體

真是不動聲色卻意味深長的排列。誰都可以看出其中巨大的悖論和諷刺意味：農民工名實不相符、名字與名字演進的自相矛盾，和歷史更迭中被欺騙的命運。

後面幾章都是農民工命運的討論的展開和深入。詩這樣結尾：

打工的名字，為找不到座位暗自羞慚

它決定對內作一次機構精簡，首先去掉那些好聽但沒用過的學名尊稱和封號重新起用曾用名，至於臨時戶口名悄悄地暫時別報，當務之急是把討厭的時髦稱呼n次方再乘以負數，算算最後值是梁山泊還是梁山伯——哦，

如果所有傷心都能化蛹為蝶……

打工的，
在改名字之前做著最後的盤點。

劉虹說，之所以修改了好幾遍才定稿，就是想讓自己的熱血走到筆端時冷凝一些，不是直接為打工者“熱呼”，而是“冷嘲”社會的自欺欺人，喚起打工者對自己命運的真切認識和權益維護意識，並警示官府不要把人“逼上梁山”。

在書寫形式上，《打工的名字》保持了劉虹一貫的風格：追求情緒的內在節奏感、語言內核的張力，以及詞語質地的強烈對比與碰撞。正如一些詩評家所稱讚的，這首詩的特點是寫得比較“智性”。劉虹自己調侃說，她的邏輯思維（理性思維）大大強過她的形象思維（直覺思維），如果被傳統詩論判定，實為一個“不適合寫詩”的人。但她始終看重詩里所傳達的思想——這塊土地上啟蒙的使命遠未完成。

劉虹的創作表明，她確實一貫重視作品的人文關懷和悲憫情懷——這是一個自由知識份子、一個詩寫者起碼的社會良知和道義承擔。她之所以能在黨中央文件之前寫出此詩（她此類關注底層群體的作品還有多篇），除了她一直“堅持要用一顆樸素的靈魂傾聽大地痛苦的呻吟、絕不切斷詩寫者與現實存在的血脈相連”這樣的寫作觀念之外，還因為她在新聞媒體工作多年，前幾年還負責過新聞投訴熱線，經常接觸到底層打工者的不平之聲、呼救之聲，聲聲讓人不安：這社會真是太黑了！簡直有官逼民反的勢頭！劉虹在工作中盡力幫他們向上投訴以解危難，但這並不足以平靜她的良心。正如她自己所說：

若不寫出來，我的筆也會不安的。這個時代仍需要鐵肩擔道義的、正直的、有熱血的詩人，社會的“痛點”也是自己生命之痛！一個詩人的痛感神經麻木，就不配寫詩了。所以我一直不能認同讓詩歌回到內心、只抒一己小悲歡、小自戀的寫作姿態。

前不久，劉虹來信說她正在編輯新詩集，出版商催著交稿，但還是要等我的回音——她叫我看看哪一輯排第一、第二？看看那首詩排第一、第二位置？她說是“求教”，我可擔當不起，但我毫不猶豫地告訴她，就按現在第一輯排第一，而且，第一首應該改為《打工的名字》……，這樣更突出這部詩集與眾不同——更注重其社會政治意義。

她在這部2004年底出版的新詩集《劉虹的詩》的自序中強調：

其實，一個人之所以選擇詩，首先來自於他歷萬劫而不泯的率真與求真的健康天性；其次是超乎常人的敏銳的疼痛感，和一顆樸素靈魂對世界深切而悲憫的撫觸。對於我，寫作最直接的內驅力，則來自於對異化人性的傳統價值和中心文化的不認同，是自覺的邊緣化精神生存下人性的持守與抗爭，是自我放逐中對豐美生命的積極吁求和無奈喟歎。

在這個消費主義時代，應警惕將詩歌淪為喪失心跳的把玩物，乃至狎褻品。

作為女性詩寫者，我秉持“先成為人，才可以做女人”的存在邏輯，不在詩寫中把自己超前消費成“小女人”。追求大氣厚重的詩風，貼地而行的人文關懷，理性澄明的思想力度和視野高闊的當下關注……

（未完）



■劉虹詩集《虹的獨唱》